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重返红军血战现场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朱超、袁汝婷、夏军)在巍峨雄伟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湘江如一条丝带静静北去。

青山历历，碧水悠悠；湘江两岸，美丽如画。85年前，数万红军战士用鲜血与生命，突破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

这是一场攸关红军生死存亡之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发出“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宣言，红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用生命与鲜血打开一条通路。

这是红军长征出发后最壮烈之战。重返红军血战现场，一草一木皆忠魂。

牺牲：赴汤蹈火谱史诗

桂北灌阳新圩阻击战陈列馆，酷暑挡不住瞻仰者的热情，馆内摩肩接踵。

简陋的武器、朴素的军装、烈士的遗物……陈列品将人们的思绪拉回85年前。红军从湖南道县出发，强渡湘江时，30多万敌军已形成一个个“口袋”，试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

为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工农红军奋不顾身，与装备优势巨大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十五团和军委炮兵营，在新圩阻击战桂军进攻，受命“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红五师参谋长、红十四团团长以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都壮烈牺牲。

红三军团第四师在界首光华铺打响阻击战。在同一天内，红十团团长沈述清和接任团长的杜中美相继牺牲。

红一军团第二师在脚山铺阻击湘军三个师。敌军的兵力越来越多，在十多架飞机掩护下，攻势越



▲来自福建长汀县的红军后人蔡金旺在广西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英名长廊找到了爷爷蔡开铭的名字(7月1日摄)。

新华社记者周华摄

来越猛。五团政委、已身负重伤的易荡平，在敌人逼近时，要求警卫员对他开枪，警卫员不忍心，他夺过警卫员的枪，将子弹射向自己，宁死不当俘虏。

中央红军以巨大代价杀开一条血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得以顺利通过湘江。此役结束，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为3万余人。

湘江沿岸仍保留着战场遗址，绿树丛中隐现昔日的战壕。在这里找到的红军遗骸，往往伤痕累累，残缺不全。沿途各种各样的红军墓，有的宏伟高大、有的只是一个小土堆；有的葬有将士骨骸，有的仅是衣冠冢；有的刻有英烈的名字，更多的是

无名无姓。

据权威统计，红军在整个长征途中，共作战660余次。平均每行军一公里，就有三四名红军永远倒下。就这样，以热血和生命，谱写了长征这一“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

信仰：不惜身死救天下

长征途中，红军普通士兵年龄不到20岁，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也只有25岁。

他们为什么不惜青春生命？在采访中，记者多

次提出这个问题，回答高度一致——信仰。

“红军赴汤蹈火、舍生忘死，最根本的是对理想信念有执着追求，他们立下了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湖南党史专家蒋元神说。

在道县一座纪念馆里，记录了陈树湘的人生轨迹。他出身于湖南一个贫苦佃农家庭，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共产党人影响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党绝对忠诚，曾对战士说：“我们始终服从命令听指挥，指到哪里，打到哪里。”

湘江战役中，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担任后卫任务，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被敌人截断，鏖战到弹尽粮绝，因腹部中弹不幸被捕。

敌人抬着陈树湘向上级邀功领赏。趁敌不备，他从伤口处掏出自己的肠子，用力扯断后壮烈牺牲，年仅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一些红军将领出身于殷实富足之家，但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毅然“背叛自己的阶级”，出身湖南浏阳大户人家的易荡平原名汤世积，18岁加入共产党，为支持革命不惜变卖家产。中共浏东特委组建游击队时，他率先报名参加，并在宣誓会上宣布改姓荡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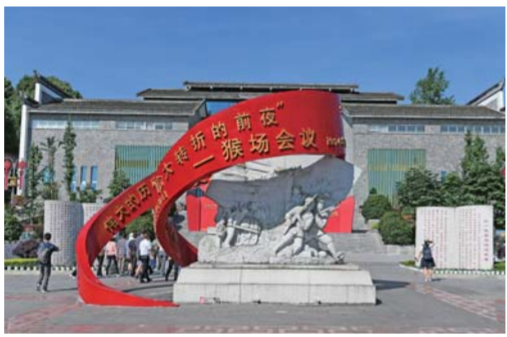
“我要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不消灭反动派，决不放下枪杆子！从今天起，正式改名易荡平。”易荡平牺牲时年仅26岁。

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灭！

“正因为革命理想高于天，红军将士身上爆发出了精神的伟大力量，战胜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付出了令人无法想象的牺牲，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兴安县红军长征史专家陈兴华说。

“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红军将士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是他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的最大动力。”通道县红军长征史研究专家胡群松说。

猴场：红军迎来新局面



▲这是7月3日拍摄的贵州省瓮安县猴场会议纪念馆外景。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会议上做报告”，这就明确指出今后的军事决策必须置于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之下，统一了军队的指挥权，限制了博古、李德独断专权。

“听党指挥是灵魂，能打胜仗是核心，作风优良是保证。”猴场会议会址管理所所长王维飞说，从馆藏的一条红军毯子和一个红军包上，就能看出即使在艰难的长征途中，红军依旧保持了严明的纪律，维护群众利益。

据猴场会议会址管理所讲解员周伟介绍，军毯是2004年在征集红军长征文物的时候，猴场镇一位叫黄平珍的老人捐赠的。黄平珍的父亲黄大武在红军长征经过黔北时，曾给驻扎在余庆龙溪的红军指路，红军指挥员把唯一能御寒的毯子给

了衣衫不整的他，这也成了他们家的传家宝。红军包则是红军过猴场时，经过村民宋国安的家发现门半掩着，就进去用杂粮给负伤的战士煮了一碗粥，之后把随身的一个棕褐色纯牛皮文件包留了下来。

再走长征路的记者一行在会址和纪念馆看到，许多单位在这里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据统计，从猴场会议纪念馆开馆至今，前来参观学习的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每年成倍递增，仅2018年就有83万多人前来参观，重温历史。

王维飞说：“瓮安县所在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许多党员干部反复来参观学习，因为来这里总能找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我们不能因为工作和生活中的琐事，就忘了党性，就忽视了政治生活。”

在距猴场会议会址不远处，记者看到了猴场会议期间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住所。周伟介绍说，当时正值阳历新年，但领导同志没有时间跟普通指战员一起庆祝。据美国新闻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采访当事人，毛泽东没让大家在年饭上“大吃大喝”，清晨四点，大部队就收拾行装，离开猴场直奔乌江渡口。

猴场会议结束当天，红军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这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称作“反攻第一仗”。红军迎来了新年，也迎来了新局面。

乌江：打响反攻第一仗



▲这是7月3日拍摄的乌江江界河渡口。新华社记者王思维摄

扎竹筏渡江。

1月1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8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在回龙场渡口乘竹筏偷渡，被巨浪吞没。1月2日上午，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突破乌江的战斗开始，由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率7名水性好的战士泅渡。晚上部队又组织18名勇士乘竹筏在江界河新渡口偷渡。

1月3日9时，强渡重新开始，红军战士在密集火力掩护下乘竹筏从新渡口冲向对岸。头天晚上偷渡成功的毛振华突然在岸上发起攻击，敌军顿时乱成一团。接着，后面的竹筏陆续跟了过去。

新华社贵阳7月10日电(记者齐健、黄可欣、董一秀)这是一座始建于1912年、集藏式风格与当地民居为一体的木结构四合院。院子开阔敞亮，仅正厅就有5间，中间为石嵌天井，四周有砖砌桶墙，原为一位本地商人的私宅。80多年前在这里召开的猴场会议，被称作“伟大转折的前夜”。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1934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负责人所在的军委纵队，抵达贵州省瓮安县的一个小乡镇——猴场，准备抢渡乌江，挺进黔北，实现黎平会议上所确定的战略方针。

这时，博古、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回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克服博古、李德指挥上的错误，确定红军进入黔北以后的行动方针，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要求下，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的宋家湾召开会议。

会议继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之后，又进一步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的指导下产生的“左”倾错误，继续准备渡乌江北上。这三次会议，为以后开好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确定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做了准备。

在猴场会议纪念馆，陈列着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的影印件。瓮安县党史专家聂其康说，《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

新华社贵阳7月10日电(记者齐健、张瑞杰、朱超)“横走天下路，难过乌江渡。”乌江又名黔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全长千余公里，天然落差2000余米，两岸绝壁高耸入云。

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决定迅速渡乌江，这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称作红军长征“反攻第一仗”。1月1日至1月6日，中央红军在江界河、回龙场、茶山关等渡口强渡乌江，随即占领遵义城。

近日，记者重走长征路来到乌江江界河渡口。

现在的乌江是这般模样：
绿——它山水连绵，山绿，水也绿；
静——它静静流淌，温柔而静谧；
通——刻有杨成武将军书写“乌江天险”四个字的北岸火山，依然直刺青天，让人望而生畏。山侧有一座大桥联通南北，水面上船只往来自如。

84年前，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时，这里堪称天险。

瓮安县党史专家聂其康介绍，当时乌江以岸陡流急著名，水不深，江水清澈见底，但明暗礁石多，江水流速快，一般的竹筏放下去转眼就冲走了，想渡江非常困难。

红军到达乌江时，国民党把船只都毁了，周围连一块像样的木板都难找到。红军只能就地取材

新华社贵阳7月10日电(记者李惊亚、马云飞)新华社记者再走长征路近日来到贵州省遵义市老城区尹路96号——遵义会议纪念馆。84年前，一场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在此转折。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楼上悬挂着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金色刻字，这是中国诸多革命旧址中罕见的毛泽东亲笔手书。从纪念馆的大门进入，一座镶红青砖的二层小楼静静伫立，这便是遵义会议会址了。

穿过宽阔的回廊和精致的转角楼梯，登上二楼，一间屋内，十多把椅子紧凑摆放在一张长木桌周围，桌下有一个火盆。这是遵义会议会议室，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连开三天。

这幢中西合璧的小楼当时为贵州军阀柏辉章公馆。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该馆是“当时遵义城内最好的建筑，从外面看去，高墙壁立，朱门厚重，巍峨气派”。15日晚，与会人员从临街大门进入，穿越过厅，绕过一座用五彩瓷片嵌字的砖砌影壁，来到位于主楼东走道的小客厅。

记者参观了按原貌陈列的会议室，听讲解员讲述遵义会议的20名参加者，如何在这间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作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

遵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为了让当代观众更直观了解历史，遵义会议纪念馆中设立了大型的裸眼3D情景展示，把人带回84年前开会现场。

特型演员扮演的博古首先作主报告，他片面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指出失败和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作为主要军事领导者之一的李德，从会议一开始就处境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3D展示重现了《红军长征史》描述的一幕：“别人发言时，他一边不停地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边不断地一个劲地抽烟，神情十分沮丧。”

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当前应采取的军事方针。他的发言得到了包



▲这是7月4日拍摄的遵义会议会议室。新华社记者王思维摄

遵义：历史在这里转折

括朱德等在内的绝大部分人的支持。会议将毛泽东选为政治局常委。

“虽然是影像展示，但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历史的真实记录。”纪念馆的讲解员说。

“在遵义会议中，中共高层领导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攸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以及最终解决，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说。

纪念馆的一面红墙上，书写着“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的大字，这被认为体现了遵义会议的精神。中共党史把遵义会议定义为“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的一首《遵义会议》诗作，道出了转折后的欢欣鼓舞。遵义会议在每一位参加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在讲话和著述中多次谈到遵义会议。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走进遵义会议会址》一书记载，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秘密举行的，不可能大张旗鼓，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为寻找和认定会址，用了4年时间。直至1957年7月1日，会址才正式对外开放。

近年来，遵义会议纪念馆面积扩大了数倍，瞻仰者不断增加，每年达400万人次。

20岁的陈旭是遵义医科大学制药工程专业大一学生，他已经是第二次来纪念馆了，“参观能够开阔眼界，比在书本上了解的历史更全面。”

纪念馆承担起了更多研究职能。“我们与遵义市的其他研究者一起探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长征’这个称谓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们经过考证，确定是在红军二渡赤水后的1935年2月23日。我们还与国际上的长征研究者保持联系，互相借鉴。”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张说。

如今，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中心，分布着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遵义红军警备司令部旧址等纪念场馆和革命旧址，连接着“红军街”。在不远处的红军山上，当地群众和外地访客多年用花圈和香火祭奠着为给群众治病而不幸遭杀害的一名红军卫生员，并称其为“红军菩萨”，表达对红军当年保护群众生命、关心群众疾苦的感激之情。